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71173181]研究成果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Based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基于资本积累效率的动态
比较优势：企业家视角的研究

■ 王永齐 著

基于资本积累效率的动态 比较优势：企业家视角的研究

■ 王永齐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于资本积累效率的动态比较优势:企业家视角的研究 / 王永齐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308-16465-8

I. ①基… II. ①王… III. ①企业经济—资本积累—研究—中国 IV. ①F279.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0652 号

基于资本积累效率的动态比较优势:企业家视角的研究 王永齐 著

责任编辑 杜玲玲

责任校对 杨利军 夏湘娣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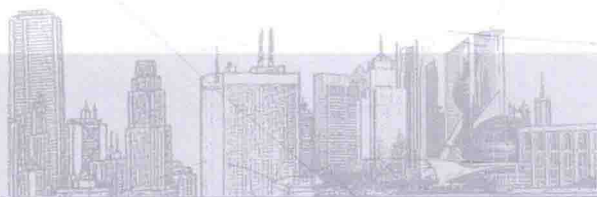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308-16465-8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本书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浙江工商大学
现代商贸研究中心项目 [批准号: 10JD SM03]
以及浙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 (应用经济学) 项目资助出版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Based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企业家精神	(4)
第三节 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特殊性	(5)
第四节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企业家精神的萌芽和发展	(6)
第五节 企业家与经济增长	(7)
第六节 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	(9)
第七节 研究内容与结构	(11)
第二章 企业家与动态比较优势:机理分析	(13)
第一节 企业家干中学效应	(13)
第二节 企业家与创新	(15)
第三节 企业家精神溢出效应	(16)
第四节 企业家风险控制能力	(17)
第五节 企业家要素组合能力	(19)
第六节 企业家与动态比较优势	(22)
第三章 两部门贸易与资本积累	(24)
第一节 比较静态模型	(24)
第二节 动态模型	(26)
第三节 简要评述	(33)
第四章 不考虑企业家时的资本积累效率	(35)
第一节 贸易条件变动	(35)
第二节 资本积累	(37)
第三节 资本回报率	(39)

第五章 企业家能力与资本积累效率	(41)
第一节 企业家与贸易条件变动	(41)
第二节 企业家与资本积累	(43)
第三节 企业家与资本回报率	(45)
第四节 比较分析	(46)
第五节 索洛模型与进一步解释	(49)
第六章 企业家与资本积累:来自中国的数据	(51)
第一节 企业家能力的衡量	(51)
第二节 中国的贸易结构	(54)
第三节 其他指标构建	(56)
第七章 企业家能力与资本积累效率:实证检验	(66)
第一节 资本产出弹性的估计	(66)
第二节 企业家能力与贸易条件	(67)
第三节 企业家能力与资本积累	(71)
第四节 企业家能力与资本回报率	(73)
第八章 企业家能力与区域增长差异	(76)
第一节 区域增长差异的表现与企业家视角的解释	(76)
第二节 企业家能力的区域差异	(82)
第三节 区域间企业家能力与资本积累效率差异:实证分析	(84)
第四节 区域内部省份的比较分析	(88)
第九章 企业家能力多维度拓展及其现实约束	(95)
第一节 企业家能力多维度拓展	(95)
第二节 企业家能力拓展的现实约束	(97)
第三节 政策选择与企业家能力的提升	(98)
第四节 总 结	(100)
参考文献	(102)
附 录	(120)
索 引	(149)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在开放条件下研究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势必涉及贸易是如何引致一国资本积累形成的这一根本性问题。众多的文献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阐述了贸易确实是促进一国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①,但对资本积累的效率涉及不多,即在要素禀赋结构和质量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可以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或者可以提高人均资本存量。基于 Solow(1956)的研究,更高的人均资本存量必然对应着更高的人均产出。

结合我国的贸易实际,进出口总额由 1980 年的 381.36 亿美元上升到 2011 年的 36418.65 亿美元,占 GDP 的比重由 13% 上升到 50%,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由 910.90 亿元上升到 311485.10 亿元,资本存量由 4134.00 亿元增加到 493692.86 亿元,经济增长率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水平。显然,贸易对于促进我国资本形成和经济

^① Harberger(1950)、Laursen 和 Metzler(1950)、White(1954)、Day(1954)、Pearce(1955)、Johnson(1956)、Findlay 和 Rodriguez(1977)、Buiter(1978)、Bruno 和 Sachs(1979)、Obstfeld(1982)、Svensson 和 Razin(1983)、Persson 和 Svensson(1985)、Bean(1986)、Mansoorian(1993)、Backus 等(1994)、Ikeda(2001)、Cashin 和 McDermott(2003)、Huang 和 Meng(2007)、Angyridis 和 Mansoorian(2008)的研究分析了贸易对储蓄的影响;此外, Bardhan(1965)、Inada(1968)、Srinivasan(1969)、Song(1993)、Das(1999)、Guillo(1999)、Baldwin 和 Seghezza(1996)、Calzolari 和 Lambertini(2006)的研究具体分析了贸易引致资本积累的各种可能。

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情况的存在^①。

另外,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与价格贸易条件经常反向变动,价格贸易条件基本呈现下降趋势,而收入贸易条件则呈上升趋势,表明我国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加依赖于低价条件下的贸易量的扩张,从而造成创汇不创收的结果,贸易收益并不理想。在贸易与资本积累存在相关性的情况下,实际上意味着贸易促进我国资本积累的效率相对低下,或者说,比较优势转换为比较利益的效率低下。

这种转换效率低下的现实反映了我国目前遵循的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两要素资源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理念,从而容易忽视动态比较优势演化过程中所可能获得的潜在收益。针对这种情况,大量的研究从多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主要的观点认为可以通过提高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积累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来提升一国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许和连等,2006;殷德生和唐海燕,2006;高云虹和封福育,2009;魏下海,2009;许培源,2012)。

理论与现实的冲突意味着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理论由于忽视贸易的动态收益可能导致一国失去潜在生产率增长以及损失同其贸易伙伴的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的机会,进而存在低估贸易收益的可能。因此,在坚持资源禀赋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比较优势的内涵,进而获得动态比较优势,提高贸易收益,对于一国而言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Redding(1999)的研究认为,比较优势是一个内生的动态演化的过程,不断将潜在比较优势转换为显性比较优势是提高长期贸易收益的必然路径,如何培育一国潜在比较优势是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内容,而人力资本积累及其所诱发的创新和干中学效应则是获得潜在收益的重要途径。诸多研究同样认为,人力资本积累和干中学效应在提高贸易收益方面有重要作用^②。

^① 沈坤荣和李剑(2003)、张立光和郭妍(2004)、盛誉(2004)、李坤望和宋立刚(2006)、李小平和朱钟棣(2006)、梁俊伟(2006)、尹敬东(2007)、刘志彪(2007)、赵文军和于津平(2008)的研究探讨了贸易对资本积累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② 关于中国问题可参见王艳和杨忠直(2005)、孙辉煌(2009)、王恕立和刘军(2012)的研究;关于人力资本模型可参见 Gerschenkron(1962)、Nelson 和 Phelps(1966)、Stokey(1991)、Mankiw 等(1992)、Benhabib 和 Spiegel(1994)、Rotemberg 和 Saloner(2000)、Ranjan(2003)、Naito(2004)、Xu 和 Chiang(2005)的研究。关于干中学模型可参见 Arrow(1962)、Klein(1973)、Rosenberg(1982)、Romer(1990)、Young(1991)、Lucas(1988)、Aghion 和 Howitt(1992)的研究。

而林毅夫一系列的文章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应该遵循其资源禀赋及由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这一增长方式是由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自主研发和人力资本积累并不必然是增长过程中的短期选择。同样的,产业结构内生于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的升级取决于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①。其对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为遵循比较优势提供了案例支持。

如果用新结构主义经济对林毅夫的观点加以概括,那么其基本的分析思路遵循这样一个脉络: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产业选择—企业自生能力—经济发展。在这样的过程中,林毅夫的比较优势观点由静态逐步转化为动态分析,并且,这样的逻辑体系表面来看,资本积累的效率在短期可能是较低的,反映我国劳动密集型生产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交换收益低下,但随着资源禀赋结构转换,产品结构必然相应转换,从长期来看,贸易动态收益将随之上升。因此,坚持比较优势可以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并为将来新的发展阶段提供必要的要素积累,过早放弃传统比较优势会受到要素投入约束,反而会降低经济发展水平。

企业自生能力在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占有重要作用,但是,从宏观层面来看,企业自生能力在林毅夫的框架内仍然主要依赖于资本和劳动双要素的价格信号传递机制,且只考虑了制度因素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这些宏观因素对自生能力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企业家作为一种独特的要素对企业自生能力的影响;从微观层面来看,林毅夫的分析同样没有考虑到企业家作为一揽子要素的支配者和特殊的人力资本必然通过“干中学”和创新等一系列具体的企业家活动对分工深化、市场规模扩大,进而对就业、生产率和创新等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并最终推动经济向更高水平转变这样的微观机制。从这个角度而言,企业家这种特殊的人力资本在提高比较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毕竟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在创新、发现市场机会和降低不确定性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正是企业家与一般人力资本根本的区别,企业家能力的高低决定着企业的产出效率,而这正是本书研究的内容。通过将企业家要素从一般人力资本模型中分离出来,单独纳入生产函数,可具体考察企业家能力对贸易条件、产出、资本积累和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因此,企业家精神显现以及企

^① 林毅夫关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论述具体可参见林毅夫等(1999)、林毅夫(2002a, 2002b, 2002c, 2011)、林毅夫和张鹏飞(2005, 2006)、林毅夫和苏剑(2007)、林毅夫和任若恩(2007)、龚刚和林毅夫(2007)、李飞跃和林毅夫(2011)、徐朝阳和林毅夫(2010)等的研究,这些研究最终归结于新结构主义经济学。

企业家才能的不断积累实际上决定了企业自生能力进而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和绩效。

基于这样的理解,本书将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将企业家能力值纳入生产函数,通过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来具体研究企业家能力对资本积累效率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企业家能力对贸易条件和资本回报率的影响。

第二节 企业家精神

随着边际革命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企业家实际上被作为一般化的劳动要素纳入生产函数,而没有显示出其应有的特质。虽然马歇尔(1890)承认企业家和非均衡的重要性,但在其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内仍然可以看到企业家的痕迹。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标志着重视企业家传统开始复兴,此后逐步形成了以下三大传统。

熊彼特传统:强调企业家是把要素组合起来实行“创新”的人,其功能在于发现并实施新的组合,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企业家不断创新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取决于企业家精神是否被配置到创新过程中(Baumol, 1990)。这一思想最终被Romer(1990)、Grossman和Helpman(1991)、Aghion和Howitt(1992)纳入内生增长理论,并演变出基于研发的内生技术创新模型^①。

奥地利传统:强调企业家如何在非均衡的市场过程中通过调整自身的行为使得经济由非均衡转向新的均衡。该传统以Kirzner(1973, 1997)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在他看来,经济非均衡是一种常态,企业家就是在非均衡过程中不断发现市场机会,从而获得利润。

芝加哥传统:强调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静态均衡分析。Knight(1921)的研究认为,不确定性的存在且不可度量使得企业家必须对未来的交易进行判断并作出决策,其功能在于克服不确定性并承担市场风险。Timmons(1978)、Hull等(1980)、Chen(1998)的研究证实了企业家相对于其他要素具有更高的风险承担倾向。由于Knight的研究采用了静态均衡分析,因此其不确定性分析最终被纳入主流经济学,并演变出不完全契约理论,即强调不确定性条件下

^① 关于这方面的文献参见Aghion和Howitt(1998)、Segerstrom(1998)、Dinopoulos和Thompson(1998)、Young(1998)、Jones(1999)的研究。

为了降低契约不完全导致的交易费用,应将剩余控制权赋予专用性投资最重要的一方。不完全契约理论实际上还是将企业家等同于资本家,没有考虑企业家的特殊人力资本特性。

第三节 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特殊性

李忠民(1999)将人力资本划分为四种类型:一般型人力资本、技能型人力资本、组织管理型人力资本和企业家型人力资本,并认为企业家要素是这四类人力资本类型中层次最高也是最为稀缺的。企业家是以自己的人力资本为资本获取收益,以经营管理企业为职业,以使企业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李永安,1997)。企业家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具有专属性,表现在其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有功能是非其他资本无法替代的(王开国和宗兆昌,1999)。同时,企业家是异质性人力资本。在企业运行中,与一般人力资本相比,企业家要素具有异质性的特点,这种异质性体现在企业家能够将企业各种资源整合在一起,以获得大于单个成员从事经营活动收益之和的组织租金,即企业家要素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生产力属性(程承坪,2001)。

张小蒂和赵榄(2009)则进一步指出,企业家要素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总是处于配置和控制其他资源的核心地位,是地区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活动中最为关键的主动性要素资源。陈建军(2002,2003)认为,企业家资源是指人格化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以及各类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工商事业开创者和经营者身上的企业家才能,其核心是创新精神和经营能力;企业家要素缺乏的区域,经济增长缓慢;而企业家要素富裕的区域,经济增长就有动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人力资本和一般资本要素密集的地区,经济增长却仍然不理想。马新建(2003)通过对企业家理论的回顾,指出企业家是企业活动的主导因素,企业家资源是经济发展最稀缺的要素资源,企业家资源发展在本质上是经济增长生产的主要源泉。张小蒂和李晓钟(2008)则认为,私营企业家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与资本、劳动力一样是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能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虽然学术界对企业家的认识和论述各有差异,但对企业家本质的观点大体相同,即企业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才资源中经济活动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创新能力、生产要素配置能力、市场机会把握和风险承担与控制能力比较优秀的那一部分人才的总称。这类人才一般是企业的一定资本的所有者,或

承担企业经营职能的高层领导者,能够凭借其创新力、洞察力和统帅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非均衡性,能对不稳定环境作出快速反应并承担市场风险,能不断发现更有价值的市场机会并创造效益,是一类特殊的人力资本(赵榄,2010)。企业家这种特殊的人力资本是内生形成的,决定着企业发展的方向、技术创新的方向、内部要素的组合结构。企业提供报酬的高低取决于企业家自身能力的高低,具有不确定性。

第四节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企业家精神的萌芽和发展

近二十年来有关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大量涌现,究其原因是人们普遍相信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熊彼特(1934)开创性的研究指出,企业家通过对产品的新组合、市场的新发现、技术的新应用等破坏性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企业家精神具有鲜明的特征,即追求私人王国的梦想、渴望财富和声望、善于发现机会并不断实施创新。尽管其他学派的学者对于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和解释存在着差别,但经济学家们对于企业家精神所包含的追逐财富、善于利用机会和创新等内涵则基本认同,尤其是企业家精神对于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的观点在经济学领域已经基本达成共识^①。

尽管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理论提出的时间较早,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数十年间,企业家精神几乎从经济学领域消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代微观经济的企业理论研究假设过于严格,这种标准一致的理论模型使得研究仅仅需要一个生产函数、理性选择逻辑和完全信息,从而使企业家的作用基本消失(鲁传一和李子奈,2000)。另外,由于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的影响,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取决于资本的积累和外生的技术进步,这也并没有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留出发挥作用的空间。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由Romer(1990)触发的内生技术创新增长理论完善了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新发展起来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强调经济激励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质量改进的存在使得高质量的新产品会替代低质量的产品,技术进步带来了“创造性破坏”。由此,企业

^① 周方召和刘文革(2013)在企业家精神差异化配置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中,对企业家精神的萌芽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文献归纳,这部分内容也来自于该综述,由刘文革教授提供。

家的创新创业精神开始逐步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熊彼特的经济增长思想在经过漫长的沉寂后又重新复苏。

在早期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Aghion 和 Howitt(1992)的研究对内生创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影响最为突出^①,他们首次将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思想纳入模型中,强调研发部门新的生产技术会替代现有技术从而获得暂时的垄断租金。在他们的模型中,垄断租金将激励企业家不断进行创新,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对知识技术创新投资的目的性和逐利性的探讨,都与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创新精神是经济发展动力的理论相一致。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企业家精神差异化配置则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与 Aghion 和 Howitt(1992)相似,同样沿着 Romer(1990)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所强调的知识溢出效应分析思路,Acs 等(2004,2009)的研究进一步指出 Romer(1990)的知识溢出模型并没有解释知识投资和溢出行为的发生机制以及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他们强调生产性的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是简化知识溢出效应的一种机制,是连接知识与经济增长之间必不可少的环节(Braunerhjelm,2010)。这些理论模型较为形象地刻画了“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思想,将行为个体有经济激励的技术创新活动纳入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但遗憾的是,以上研究仅提出了研发部门的创新,而没能将企业家精神明确地模型化。

第五节 企业家与经济增长

在熊彼特(1934)看来,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经济长期增长的真正源泉,正是具备创新灵魂的企业家不断地开发新产品、引入新的生产方式、开辟新市场、建立新的组织结构才推动了经济的动态发展。

尽管熊彼特关于企业家创新思想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所继承,而且大多数的理论研究都认为企业家精神对于一国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Romer,1990;Grossman 和 Helpman,1991;Aghion 和 Howitt,1992),但是在

^① Schumitz(1989)、Sanders(2007)等学者也都对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数理模型的分析。Schumitz(1989)第一个将企业家精神明确模型化并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但是在他的模型中将企业家活动的作用严格限制在模仿创新方面,仅仅强调了模仿活动的作用,这一局限使得其研究的影响力和解释力远不及 Aghion 等(1992,1998)的文献。

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内生经济增长文献中,对于研发投入和技术水平巨大跨国差异现象的成因仍缺乏合理的解释(庄子银,2007)。自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由Romer(1990)触发的内生技术创新增长理论完善了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新发展起来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强调经济激励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质量改进的存在使得高质量的新产品会替代低质量的产品,技术进步带来了“创造性破坏”^①;由此,企业家精神开始逐步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熊彼特的经济增长思想在经过漫长的沉寂后又重新复苏。

早期包含企业家精神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Aghion和Howitt(1992)的研究对内生化创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影响最为突出,他们首次将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的思想纳入模型当中,强调了研发部门新的生产技术会替代现有技术从而获得暂时的垄断租金。在他们的模型中,垄断租金将激励企业家不断进行创新。这种企业间的创新竞赛将推动技术的不断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对知识技术创新投资的目的性和逐利性的探讨,都与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创新精神是经济发展动力的理论相一致。

Acs等(2004,2009)的研究进一步指出Romer(1990)的知识溢出模型并没有解释知识投资和溢出行为的发生机制以及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他们强调知识本身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只有当知识被转化成经济知识并进一步形成商业机会的时候,由于不同个体对于机会和期望收益的评价不同,某些经济个体开始创办新的企业来谋求获利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企业家精神是简化知识溢出效应的一种机制,是连接知识与经济增长之间必不可少的环节(Braunerhjelm,2010)。Minniti和Levesque(2010)借鉴Schmitz(1989)的企业家模仿创新思想,在产品种类扩大的技术创新增长模型基础上,将企业家精神区分为创新型与模仿型并同时纳入增长模型进行分析;由于模仿型企业家对创新中间品的模仿会带来竞争,因此在均衡状态下,创新型企业家和模仿型企业家均对创新的增长率产生积极影响,只不过模仿型的企业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间接的。

多数实证研究都发现,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生产性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例如,Beugelsdijk和Noorderhaven(2004),Lazear(2004),Audretsch和Fritsch(2003)的研究都表明,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是导

^① 有关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演进脉络和研究进展,参见潘士远和史晋川(2002)的文章。

致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生产性的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活动有助于促进地区更高的经济增长率。Mueller(2006),Audretsch 和 Keilbach(2008)以德国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发现企业家创新精神和研发强度都会推进地区的经济增长。Glaear 等(2012)以美国 20 世纪中期的矿产和煤炭资源型城市为样本,在控制了企业家精神和雇佣率增长的内生性之后,利用工具变量的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了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生产性活动和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就美国城市而言,用 1970 年代城市所具有的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自我雇用率)可以预测该城市未来三十年的人口和收入增长水平。Erken 等(2009)就以 20 个 OECD 国家 1971—2002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为被解释变量、企业所有权比率衡量的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为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生产性活动对于生产效率(TFP)具有稳定而显著的积极影响。

部分学者也以转轨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如 McMillan 和 Woodruff(2002)对俄罗斯、波兰、中国以及越南等转型经济的分析指出,转型经济能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精神,那些对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限制过多的经济体往往经济绩效也较差。Berkowitz 和 Dejong(2003)对苏联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原因的分析结果表明,在考虑了初始条件和政策改革措施的影响之后,企业家精神的活跃程度与苏联解体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在统计上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李宏彬等(2009)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以中国 1983—2003 年省级层面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且这种关系是因果性的”。

第六节 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

本书在新古典增长框架内,探讨开放条件下企业家要素对一国资本积累效率的影响,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将企业家能力纳入分析过程,具体判断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不同的情况下,要素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所导致的部门间资本劳动比、资本比变动对一国资本积累效率的影响。为此,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1)数理模型分析。在新古典增长框架内,以 Solow 模型为基础,在 Stiglitz(1970)和 Mazumdar(1992)模型基础上,通过构建消费品—资本品的

两部门贸易模型,将企业家要素纳入生产函数,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条件约束下具体讨论三个问题,一是部门间企业家能力、资本比、部门内部的资本劳动比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二是企业家能力、资本比、部门内部的资本劳动比变动对资本积累的影响;三是企业家能力、资本比、部门内部的资本劳动比变动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

(2)比较分析。在数理模型基础上比较分析部门间要素产出弹性相同时与不同时的结果,以及本研究的结果与 Stiglitz(1970)研究结果的差异,进而判断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比较优势部门的企业家能力和资本产出弹性上升对于改善贸易条件、提高资本回报率和资本积累效率的重要意义。

(3)实证分析。在数理模型分析和比较分析基础上,借助中国相关数据,通过构建相关指标,采用 VAR 方法对数理模型中涉及的相关变量与资本积累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通过逐个加入变量的方法具体检验贸易结构约束下企业家要素对贸易条件、资本回报率和资本积累的影响。此外,结合我国不同区域的相关数据,对企业家能力的区域分布与区域增长差异进行分析,解释区域增长差异的重要诱因之一在于企业家能力的区域分布不均衡。

总的来看,关于贸易条件、资本积累和资本回报率的研究文献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这三个变量本身的变动进行分析,考察影响这些变量变动的因素有哪些,或者是这些变量的变动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二是对三个变量中的两个进行分析,考察贸易条件变动对资本积累或资本回报率的影响,以及资本回报率对贸易条件或资本积累的影响;三是将这几个变量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进行分析,但主要关注的问题在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贸易条件变动和资本回报率的变动。从这个角度而言,本书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资源配置这样的微观角度来考察贸易条件变动的原因及其对资本积累和资本回报率的影响。通过理论模型证明资本和劳动在不同部门的流动导致的部门内部的资本劳动比变化以及部门间的资本比变动对贸易条件产生的影响,证实了比较优势部门内部的资本劳动比上升,意味着资本密集度提高,这将对贸易条件、资本积累和资本回报率产生不同的影响,以及比较优势部门相对于其他部门的资本比上升所产生的影响。从微观层面考察其宏观经济效应。

二是将企业家要素纳入生产函数,来分析企业家能力值的上升对贸易条件、资本积累和产出水平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在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资本回报率的基础上促进资本积累,这时的资本积累效率达到最优,而资本积累和回报率提升往往是矛盾体,从新古典的分析框架来看,资本积累的

上升往往意味着回报率下降,如何克服这一问题,将企业家纳入生产函数是一种尝试,本书理论和实证的研究证实了企业家能力上升能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资本积累效率的作用。

三是将区域差距问题理解为企业家能力的区域差异,正是由于企业家在区域分布的不均匀以及企业家能力的高低导致资本积累效率方面的差异,进而引起区域收入分配差距。从产出的角度来讲,提升企业家能力对提高一个地区的资本积累速度产生促进作用;从要素分配的角度来讲,提升企业家能力对于提高区域人均收入水平同样重要,如果一个地区可以在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基础上提高人均收入水平,这样的资本积累就具备产出和分配过程中的高效率。

第七节 研究内容与结构

第二章围绕 Stiglitz(1970)的研究展开,具体讨论其两部门贸易模式下资本劳动比变动对贸易条件和资本积累的影响,以及其结论的适用性问题,在这一重要的有关贸易与增长、福利的文献之后, Vanek(1971)、Deardorff(1973)和 Smith(1984)基本得出了与 Stiglitz(1970)相同的结论:贸易双方进行完全或部分的分工,贸易能否促进资本积累的关键在于资本品的价格,只要贸易能够提高资本品的相对价格,都将促进资本密集型生产部门的资本积累水平,并且贸易可以提高双方的福利水平。Baldwin(1989,1990)则对上述结论提出批评,并将模型加以动态化进而强调资本积累效应对比较优势效应的放大作用,作用的机理在于规模报酬递增和资本回报率上升;Mazumdar(1992)则在此基础上考虑到资本品价格与贸易结构之间的关系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将 Baldwin 的模型加以修改从而得出与 Stiglitz 相反的结论。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和述评引出本研究观点:要素配置在消费品—资本品贸易结构中对资本积累起着决定作用。

第三章对企业家能力与企业自生能力的关系进行阐述,在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基础上,将企业自生能力取决于企业家能力的观点引入分析框架,探讨企业家决定企业自生能力的因素:机会获取能力、外部资源整合能力与内部资源整合能力的影响,揭示企业家在这三种能力的获取方面具有的重要作用,企业家作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力资本,其对企业的自生能力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四章在新古典增长框架内,结合赫尔歇尔-俄林理论,在不考虑企业家